

非精英群体的回流与再适应研究

——以福建省福清市回流移民为例

陈友华 洪晓羽

摘要 本研究以12名福建省福清市非精英移民为研究对象,对其回迁原因及再适应情况展开质性研究。研究发现,相比于精英移民群体,非精英移民群体本身由于综合素质较低、拥有资本较少,无论是在回流还是再适应过程中,都会面临更多的挑战;他们的回流除了受到移民国与母国社会双重作用力的影响外,移民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回流再适应过程中,尽管出现某些不适,但回流者并没有表现出消极悲观的态度,而是将其视为正常现象。通过心理调适与家庭支持、社会行为本土化与再学习、资源的跨国转化与链接等策略能帮助回流移民更好地适应母国的生活。

关键词 非精英移民 回流 再适应

DOI:10.13878/j.cnki.yjxk.2022.05.012

一、研究背景

(一) 问题提出

福建省福清市是著名的侨乡之一,福清人旅外谋生的历史悠久,且人数众多。^①新中国成立以前,福清的出国人数不足10万人,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家放宽了因私出国的限制,一批批福清人通过留学、劳务、探亲等渠道走出国门,形成了一股股出国热潮。但是,在移民输出潮持续扩大的同时,福清也迎来了越来越多的移民返迁。当带着多年移民国习惯的行为与文化回到既熟悉又陌生的母国社会时,回流者是否能够马上转换角色,以原来的社会文化或行为方式顺利地生活与工作,还是需要重新适应?他们会完全放弃移民国文化,还是将其与母国文化进行融合?他们对于母国社会是否会有一种新的观察和认识?此类问题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作者简介: 陈友华,社会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洪晓羽,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公共政策及其机制研究”(17ZDA120)

^① 林胜、朱宇《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福建福清的海外移民活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这些回流者作为移民群体中的一部分,既了解中国国情、与中国有着紧密联系,又在旅居海外期间积累了一定的专业技能、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他们回到中国,将有助于促进中国的发展,并推动全球化进程。研究回流群体迁移的动机与再适应策略,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推动回迁移民群体的再适应,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稳定。

(二) 研究现状

移民回流研究始于20世纪初跨国移民的出现。正如罗素·金(Russell King)所说,有移民就会有回流。^①从开始研究移民回流至今,国内外学者对于移民回流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国外对于移民研究起步早,已形成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包括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迁移经济理论、社会结构理论、跨国主义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等角度探讨移民回流的动因及其影响效应。20世纪70年代,赛瑞斯等人在对意大利回流移民的研究中提出了四种回流类型:退休型回流(return of retire)、失败型回流(return of failure)、保守型回流(return of conservatism)和创新型回流(return of innovation)^②,这些回流分类研究对于当今国际移民的回流现象仍有一定的解释意义。但是,当前的回流现象和20世纪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移民国和母国之间的经济水平差距、回流者在移民国居住时间长短、移居海外初衷以及回流目的等因素仍然对回流有着重要影响。此外,随着交通运输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回流行为也变得更加容易实现。^③

虽然国内学界关注到移民回流的时间较晚,但近年来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关于移民回流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留学归国、高技能型、投资型等精英移民的讨论^④,并且从就业环境、科技教育投入、移民政策调整等角度分析回流动因。^⑤对移民回流后的再适应问题的研究较为鲜见,且主要尝试以跨文化适应理论为基础来解释,回流移民再适应过程中所经历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从文化适应的角度来研究回流移民的再适应问题。^⑥

① Russell King, "Generalizations from the history of return migration", Ghosh, in: Ghosh, Bimal (ed.), *Return Migration: Journey of Hope or Despair?*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Geneva, 2001.

② Francesco P. Cerase, "Expectations and reality: a case study of return migr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southern Ital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8, no.26 (1974).

③ Alejandro Portes, Luis E. Guarnizo and Patricia Landolt,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ism: pitfalls and promise of an emergent research field",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22, no.2 (1999). Alejandro Portes, "Introduction: The debates and significance of im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Global Networks*, vol.1, no.3 (2010).

④ 骆克任、何亚平《海外回流人才基本状况的调查》,《社会》2003年第12期。中共福建师大党委统战部《福建师大归国留学人员基本情况及思考》,《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马凌、谢圆圆、张博《跨国主义视角下高校海归知识移民的回流与地方嵌入》,《地理学报》2022年第6期。

⑤ 王晓莺《海外华人专业人才回流态势》,《人才开发》2004年第1期。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课题组《我国海外人才回流的动因分析》,《软科学》2004年第5期。周桂荣、刘宁《吸引人才资源回流的经济与科技因素》,《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颜廷、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回流:历史、现状与趋势》,《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

⑥ 庄怡川《国外有关归国人员文化再适应研究综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任杨《归国人员文化再适应问题研究》,《中国高等教育》2019年第10期。曾少聪、闫萌萌《海外新移民的回流研究——以闽西北新兴侨乡归县为例》,《世界民族》2019年第2期。

二、研究设计

(一) 概念界定

已有学者尝试对非精英移民群体的概念进行界定。^①但目前学界对于非精英移民群体这一概念尚未有精准定义。针对目前的国际移民群体,大致可以将其分为精英移民和非精英移民。在人类活动领域内表现极为优秀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精英。精英群体在公有或私有领域占据重要地位。^②精英移民群体往往带着资本、知识或者技术等资源移居海外,而非精英群体则相反,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地区,综合素质较低,出国前工作收入大多不高,且出国的主要目的是赚钱而不是追求学历和高技术。本文所讨论的福清市回流移民显然属于后者。

(二) 受访者的基本情况

笔者于 2020 年 1—2 月、7—8 月以及 2021 年 2—3 月前往福清市进行实地调研,共对 12 位回流移民进行深度访谈,他们均为在国外生活或工作 5 年以上,并且回流后在国内生活或工作超过 1 年的非精英群体。本文以深度访谈为主,参与式观察为辅。深度访谈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形式,每次访谈时间在两小时左右。此外,笔者还通过参与观察法,在实际参与研究对象日常社会生活的过程中观察他们的语言表达、行为及态度,对他们回流后的再适应情况有更多更全面的了解。12 位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非精英移民群体基本信息

编号	年龄	性别	出国时间	回国时间	移民国家	文化程度	在移民国职业	回国后职业
1	35	男	2010	2017	南非	高中	电器店店主	服装厂经理
2	45	女	2009	2018	阿根廷	职高	小商品店主	待业
3	38	男	2005	2013	南非	初中	超市打工者	工厂员工
4	44	男	2003	2016	澳大利亚	初中	装修工	装潢店老板
5	56	男	2002	2015	阿根廷	小学	超市店主	小区保安
6	48	女	2004	2016	日本	小学	餐馆打工者	代购、保姆
7	41	男	2002	2014	美国	中专	餐馆厨师	餐馆合伙人
8	43	男	2003	2016	英国	高中	电工	物业维修员
9	51	女	2005	2017	阿根廷	小学	超市收银员	待业
10	44	男	2008	2015	澳大利亚	初中	农场打工者	出租车司机
11	48	女	2003	2020	英国	初中	餐馆老板	待业
12	34	男	2012	2019	阿根廷	职高	超市打工者	快递员

① 李春光《温州人在巴黎: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中国社会科学》,1999 年第 6 期。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2 年,第 513—528 页。周欢怀、朱沛《为何非精英群体能在海外成功创业?——基于对佛罗伦萨温商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4 年第 2 期。

② 江颖《当代中国社会的精英生成机制及趋势讨论》,《中国市场》2011 年第 27 期。

在笔者访谈的 12 位研究对象中,10 人年龄在 50 岁以下,2 人超过 50 岁;男性 8 人,女性 4 人;在国外居住时间:3 人 7 年,1 人 8 年,1 人 9 年,7 人 10 年及以上;移民国家:6 人是发达国家,6 人是欠发达国家;文化程度:3 人小学,4 人初中,5 人高中、职高及中专。

从表 1 中可以看到,受访者在回国后基本上都经历了职业的转换,还有 3 人目前为待业状态。据笔者了解,12 位受访者中有 7 位回国后的收入明显低于其在国外工作的收入,3 位受访者目前的收入与其在国外工作的收入基本持平,2 位受访者表示自己目前的收入略高于自己在国外的收入。笔者发现,这些受访者在海外多受雇于他人,且没有大量固定资产,因此更有可能且更容易发生回流行为。

毋庸置疑,移民回流给自己和家人乃至家乡和整个社会都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对个人来说,回流即是改变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一些回流者将来可能停止迁移,但有些回流者可能会考虑在短期再迁移至其他国家。对于家庭来说,回流意味着在一定时间内少了一份收入,但在亲情陪伴等方面却能给予相应的补偿。同时,移民回流给家乡和社会重新注入了新鲜血液,能够带动当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为家乡发展做出贡献。有些移民回流后担任村干部,积极参与乡村治理,运用自己曾在海外务工经商的经历优势,整合国内外资源,更好地为建设家乡服务;^①有些移民回流后通过投资和创业,能调动更多的储蓄和技能,同时还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与税收,会对当地经济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②

三、非精英移民回迁动因

关于国际迁移动机研究,目前主要有推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与新经济移民理论。^③上述理论研究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移民的迁移动机,但这些研究较多关注人们迁出的原因,对于移民的回流动因涉及较少。事实上,关于非精英移民回流的动因,往往不会只受单个因素影响,而常是个人基于自身与家庭等因素考虑而做出的综合决策。客观上,它受国内外社会经济形势变化和经济全球化持续推进的影响,同时,移民国相关政策变动以及国内经济与人口政策的影响也不容小视。主观上,它是移民迁移目的和动机多样性选择相互作用的结果。^④经过分析,笔者将非精英移民回迁动因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 移民国的不利因素限制非精英移民发展

1. 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推动非精英回流

本研究访谈的福清回流移民所选择的移民国主要集中在阿根廷、英国、澳大利亚,这三个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由于在不同国家的移民所从事的职业不同,加之每个移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不同,因此每个国家对

① 陈凤兰《华侨村官与侨乡社会治理资源的跨国动员——以福建省明溪县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7 年第 1 期。

② Hamdouch B, Wahba J, "Return migr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Morocco", *Middle East Development Journal*, vol.7, no.2 (2015).

③ 李明欢《20 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4 期。

④ 陈程、吴瑞君《回流视野的大陆新移民》,《广西社会科学》,2014 年第 10 期。

移民回流形成推力的具体表现也各有所异。

(1) 阿根廷严重的债务危机与低迷的市场环境

在阿根廷,本国严重的债务危机以及低迷的市场环境成为推动这些非精英移民回迁的最主要原因。据了解,在阿根廷的福清移民所从事的行业大多具有边缘性,主要经营中小型超市和餐饮,其次是礼品店、旅行社、进出口贸易、洗衣店、律师事务所和咨询中心等。他们大多聚集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及周边地区,分布较为集中。曾经在阿根廷经商的张某和吴某都声称,由于目前阿根廷经济萧条,导致自己的利润严重下滑,无心继续经营。

笔者访谈得知,在这些移民刚到阿根廷时(一般是 2000—2010 年),“不管是超市还是其他销售行业,生意都算兴隆,收益也相当可观。不到两年时间就能还完出国及开店时所借欠款,开始有了存款。”“那时,在阿根廷只要肯吃苦,基本上没有赚不到钱的人。”自 2012 年以来,由于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阿根廷经济增速明显放缓,通货膨胀加剧,比索贬值,外汇储备下降。到 2018 年,在债务负担、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的多重因素冲击下,阿根廷经济濒临崩溃。在阿根廷的这些非精英移民群体大多以打工者的身份谋生,有的也经营小店,受到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他们的实际收入大幅度减少,因此就有一部分人选择抛掉手中的店面或者不再打工,选择回国发展。

(2) 英国政府严厉打击“非法”移民,无证移民处境举步维艰

2010 年英国联合政府执政后,减少净移入人口成为其主要政策,即对吸引国际留学生的教育产业采取紧缩政策、对非法移民进行严厉打击。在此情况下,兼为客源和劳动力的留学生和作为廉价劳动力的非法移民大幅减少。虽然可以增加合法劳工以满足用人需求,但成本也随之增加,所以大多数雇主会选择延长工作时间来弥补损失。在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下,多方面不利因素使得这些没有获得合法签证的移民不得不遭受工作时间延长、工作条件恶化和工资待遇降低的夹击。如王某告诉笔者“我 2013 年回来的,英国那边政策变了,抓得更严了,没身份的找工作也难。我一个朋友在那边开餐馆,也亏了很多啊。”许多在英国打工的福清人,因为当地政府的打压,打工生活变得艰难。还有一些为了获得永居身份常年在英国打工,之后再申请与配偶子女团聚的移民,由于政策的变化,申请永居身份的标准变高,他们迟迟无法获得永居身份。

(3) 澳大利亚移民政策调整,非技术移民难以生存

在澳大利亚,以就业为目的的移民主要包括普通劳工移民和技术移民。然而,自 1996 年霍华德政府上台之后,由于受到国内外形势的影响,霍华德政府在经济理性主义指导下,根据澳大利亚国内经济发展需求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变化,对澳大利亚移民政策进行了全方位调整,逐渐将澳大利亚移民计划的重点转向技术移民。^①此后,每年有大量拥有良好教育背景的高素质专业技术人员入境澳大利亚,这无疑导致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非技术人才的职业发展空间十分局限。如果不是技术移民,想在澳洲获得签证有相当大的难度。正如在澳大利亚打工 13 年的访谈对象钟某所说“在澳洲,除非你有文凭,

^① 颜廷、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回流:历史、现状与趋势》,《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 年第 4 期。曾少聪、闫萌萌《海外新移民的回流研究——以闽西北新兴侨乡归县为例》,《世界民族》2019 年第 2 期

能讲英语有技术,不然大部分都跟我一样干体力活赚钱。”由于移民政策紧缩,这些普通劳工移民的签证变得越发难以获得,而且就业也越发困难。这些非精英移民就算在澳大利亚工作了十数年,但因为无法达到技术移民标准,依然无法获得签证。无奈之下,很多移民只能选择回流。

2. 汇率变动导致实际收益不断缩水

由于汇率变动而导致实际收入大幅缩水,这也是非精英移民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许多移民要把在国外赚的钱先是换成美元或英镑,再把美元或英镑转换成人民币带回国。近年来,由于人民币不断升值,外币相对贬值,使得在国外赚钱谋生的非精英移民实际收入出现大幅度缩减。

据笔者了解,随着近年来人民币不断升值,这些福清移民的收益都在不同程度上缩水。据访谈对象张某透露“很多在阿根廷赚钱的福清人,他们除去自己日常开销外,大部分的钱都寄回国内,比如买房、建房、子女的生活与教育费用等。”假设他们每月赚到的阿根廷比索是不变的,但比索相对美元贬值了,美元相对人民币也贬值了,在双重贬值下他们亏损了很多钱。在澳洲打工13年的钟某也声称“澳元真的跌惨了,本来还能跟美元平起平坐,现在真的差太多了,辛辛苦苦打工赚了点澳元,换回人民币又要损失一大笔钱”。其他移民也直呼因为汇率变化,这些年赚钱不容易。因此,汇率大幅度变化,也是导致他们回流的另一重要因素。

3.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推动移民回流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在全球蔓延,造成了空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限制了各种形式的人口流动,其中受限最大的是国际移民。各国加强了边境管控并严格限制签证,无形中提升了国际迁移的难度。但是,随着国内疫情趋于平稳,国外疫情持续恶化,在面对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部分海外移民还是会想尽办法回国。

在笔者访谈的12位回流者中,有2位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回流。从阿根廷回来的肖某说道“在非常时期,很多航班都被熔断,我们想要回来都得购买高价机票,票价是以前的五六倍,有些人甚至组团包机,总之回来很不容易,但是又不得不回来,在外面可能命都没了。”从英国回来的李某跟笔者说“本来想等疫情过了再回家,但是看着这边(英国)每天这么多人感染,也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如果不回去,说不定哪一天自己也中招了,所以还是决定回去。”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活动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因此,对于新冠肺炎疫情过后是再迁往国外还是干脆留在国内,回流的移民目前还处于观望状态。

(二) 国内环境有利于非精英移民群体发展

1. 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既是挑战,更是机遇,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革。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虽然目前还置身于发展中国家之列,但部分沿海地区经济已经接近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近年来,国内经济发展迅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随着国外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下滑和人民币汇率的提高,使国内外居民收入差距逐渐减小,尤其是像福清这样经济发展较快的东部沿海城市,这势必会对海外非精英移民群体产生巨大影响。去日本的潘某对笔者说“我刚

到那边(日本)不会讲话,就在厨房里面洗碗打下手,还同时在洗衣店打工,很辛苦,但那个时候感觉还能赚一些钱,就一直坚持了下去。但是过了几年这边钱也很不好赚。我有一个朋友当时本来要跟我一起走的,因为家里人不肯,最后我就自己来了。她就在家开一家小花店,没我这么辛苦,但这几年赚得也不少,在家里还能照顾到家人,感觉自己当时选择出国亏大了。”不仅如此,国内的政治和治安环境相比于国外要稳定得多,人身财产安全也相对更有保障。尤其是像南非、阿根廷等社会环境不安定的国家,由于治安问题选择回流的移民较多。因此,当国内外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或相差不大时,一些海外非精英移民便会产生回国发展的想法,尤其是在一些治安不稳定的国家,回流现象更加明显。

2. 个人需求与发展目标发生变化

有些移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海外打拼多年,不仅还清了出国时因筹集费用所欠债务,还获得了一定的经济积累,基本上实现了自己出国时的计划,或已经满足了个人及家庭的经济目标,这时,如果他们在国内能寻找到更好的谋生方式,便会选择离开移居国回母国发展。在美国中餐馆当厨师的洪某说:“之前去美国是因为家里欠了点债,为了还钱才出国。现在债还清了,还赚了点小钱,因为我本来也没打算在这边一直打工,刚好我姐夫想在家里开一个餐馆,我想现在国内的发展前景也不错,就选择回来跟他一起开店了。”

此外,据笔者了解,这些福清移民大多面临家庭分居两地的状况,有的是夫妻一方(多为男方)在国外打工赚钱,另一方则留在国内照顾孩子和老人,有的则是夫妻二人在国外打工,把小孩留在国内由父母或其他亲戚照看。对于在国外打拼的非精英移民来说,辛苦繁忙的工作之余最让他们牵肠挂肚的就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妻儿,正是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也促使他们在国外工作生活一段时间,特别是赚钱的愿望得以实现后,便会尽快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

3. 落叶归根的乡土情结

笔者的访谈对象中有 2 位年龄已超过 50 岁,他们是青壮年时期出国打拼,由于对母国生活的美好回忆和文化认同等原因,在年老时就产生了落叶归根的想法。在访谈时笔者发现,多数受访者表示,未来不会在移民国养老,到了一定年纪便会回国安享晚年。此外,由于年龄增长,移民的体力与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尤其是从事体力劳动或工作时间过长的移民,由于身体长期处在超负荷工作状态,或多或少身体都有一些疾病,当他们到了一定年龄,认为自己的身体无法承受如此繁重的工作压力时,便会返回母国。

四、非精英移民群体的再适应策略

弗海姆(Furnham)认为回流移民的再适应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对于这些在异国生活而后又回流到母国的非精英移民群体,他们会经历心理和社交上的双重不适,对于曾经熟悉但又阔别已久的母国文化环境会产生类似于进入新文化环境后的陌生、焦虑和恐惧感。在归国适应期,回流者拥有双重文化身份:母国文化和移民国文化,他们既无法完全褪去在移民国形成的价值理念而完全融入母国环境,也无法摆脱国内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完全使用移民国的生活模式。因此,回流者需要使用一些必要的策略,通过态度、认知、行为等方面的改变,帮助自己完成再适应过程。

(一) 心理层面: 心理调适与家庭支持

对于回流者而言,从移民国回到母国将经历“变化”和“差异”的过程,这时难免产生心理上的冲击和压力,进而可能出现“文化震惊”。面对环境的变化,如果回流者能根据自己情况进行有效的心理调适,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心理压力,减少不适应感。因此,适当的心理调适是回流者顺利融入母国社会的首要任务。

笔者访谈的12位福清籍回流移民,全部在国外生活或者工作超过5年,还有7位超过10年。而在此期间,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适应“新”环境,回流者都进行了必要的心理调适。

笔者发现,这些回流者在面对新环境以及新事物所带来的冲击和心理压力时的典型做法是:给自己一个合理的主观解释。回流者在感受客观环境的变化时,会对自己关于某些情景的期望,以及在情景中的行为做出相应调整,从而使自己更快地适应现状。多位受访者都谈及他们回国后对中国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感到不适,尽管如此,他们认为这些都属于正常现象,很快就能解决。正如访谈对象黄某所说“在国外,我们基本上就和自己身边几个中国人打交道,平时和当地人接触、交流的机会也较少,人际交往很简单。突然回到国内确实有点不习惯,毕竟圈子变大了,不过一段时间就自然习惯了。”相比于复杂的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困扰,他们更愿意把这些看作是自己积攒人脉资源的一种方式,为他们今后在国内的职业发展做铺垫。在澳大利亚工作7年的洪某也曾说道“在国外不是你想交朋友就交朋友的。”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在面对无法改变的客观现实时,他们一般会采用建设性的心理应对机制,希望通过自己理性的主观解释来减少由于外界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心理压力,并以积极乐观的心态来适应中国的社会现实和运行规则,这样的心理调适策略为回流者再适应提供了有利的心理支撑。

此外,大部分回流者说,亲友比较支持他们回国。对一部分老年移民来说,子女希望他们能回到自己身边安度晚年,以便照料。另一部分青壮年移民则认为,现在国内发展速度快,就业机会多,跟家人好友能互相照应。总的来说,家庭支持对于回流者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心理鼓励,有利于他们的再适应。

(二) 行为层面: 社会行为本土化与再学习

文化学习理论强调移民的适应是一种在新社会里学习社会规范和行为技能的过程。与当初为了融入移民国社会所经历的强烈文化冲突和巨大心理压力不同,这些移民回流到母国之后,并不需要经历彻底否定和抛弃自己在移民国习得的文化和行为习惯这样一个去文化过程。相反,他们只需要重新唤醒已经遗忘的母国的社会行为和文化理念。^①如张某在访谈中所说“在国外出再大的太阳我基本都不打伞,因为大家都不这么做,就你一个打伞很奇怪,但回国了身边人都会打(伞),我自然也会跟着做了。”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很多移民回流后普遍遇到对电子产品的不适应问题。最明显的就是移动支付的普及,这让一些四五十岁的回流者感到吃力。在阿根廷工作超

^① 丁月芽《回流移民再融入的生活史研究——以加拿大回流北京的技术移民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赵琴琴、吴青《华人华侨回流二次创业研究现状与展望——兼评温州华人华侨之创业》,《当代经济》,2019年第3期。

过 10 年的洪某曾说道“我在阿根廷出门都要带现金,哪里有什么支付宝呀!最多就是刷卡。回到国内看到大家都不带现金,只要一个手机就足够了。但是像我们这样文化程度不高又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的人来说,一下子确实跟不上科技脚步,我到现在还不太会网购,不过平时在外面买东西用手机支付没什么问题了。”长期在海外生活,导致他们与国内的生活环境发生断层,对移民回流后的再适应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些移民有着多年的海外生活经历,他们拥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因此,对他们来说,再学习的过程并不困难。

(三) 经济层面:资源的跨国转化与链接

回流到母国后,如果能将在移民国所积累起来的各种资源进行适当转换,则可以为回流者再适应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持。这些资源包括在国外习得的语言、技能、就业经历、人脉资源等等,尽管这些并不是高端资本,但对于他们回流后的再适应也能够起到不可忽视的支持作用。

由于大多数回流者在回国后还继续和移民国的朋友、同事等保持较密切的联系,这些出于工作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人际社交网络成了他们事业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源,有些回流者通过跨国社会资本找到了新的谋生职业。由于社会治安问题从南非回流至福清的何某表示“我刚回国时很长时间都没找到工作。后来偶然间和我之前的合伙人聊天谈到自己在找工作,经他介绍,我目前在我们当地一家小型服装厂当经理,收入也不错。”

笔者发现,回流前后的职业变化也会对回流者的再适应产生影响。一般来说,职业的变化会伴随着经济收入而变化。对于回流后职业地位上升的移民来说,他们的再适应过程相对更加容易。他们可以利用现有资源获取相应支持,帮助自己缩短“缓冲期”,更快完成再适应过程。而对于职业地位下降的回流者来说,一部分是年龄较大,回国后没有再就业,选择在家料理家务与带孙辈,这类回流者在适应方面并未出现太多的困难,赚钱的重任已经不再必须由他们承担,没有工作能让他们更好地休息。另一部分是正值青壮年的回流者,他们在回国后的职业地位及收入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再适应过程也会更长一点,再适应难度也会更大一些,但他们认为,在国外多年所获得的经验和能力还是能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提供帮助。

五、结 语

(一) 结论

笔者通过对 12 位福清市非精英回流移民的观察与访谈,分析了其回流动因与再适应策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非精英移民作为回流移民中的一部分,相比于精英群体,他们本身综合素质较低,所拥有的各类资本也远少于精英移民,在进入移民国时就已经显露出自身劣势:更难于被当地社会接纳以及自身适应困难等。与此同时,这一群体的回流行为也很少受到社会关注,因此,在回流与再适应过程中可能会面临诸多问题。随着非精英移民回流数量日益增多,他们的回流与再适应情况应该引起社会的重视。

其次,从回流动因来看,除了受到移民国与母国社会双重文化影响外,移民个体的主

观能动性也发挥着一定作用。回流是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回流的再适应过程中,虽然也经历过“文化震惊”与不适应,但是回流者并没有表现出消极悲观的态度,反而相对乐观地看待这些不适应,他们大多通过心理调适与家庭支持、社会行为本土化与再学习、资源的跨国转化与链接等策略以便更好地适应母国的生活。

最后,移民本身就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对外部环境适应能力较强,且经历过跨国社会适应锻炼的群体而言,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往往更强。不仅如此,回流者在再适应过程中多表现出自觉、积极的态度,因而回国后社会再适应状况普遍良好。尽管如此,对非精英群体来说,再适应仍然是一个复杂的、受多种因素困扰的过程。

(二) 思考与建议

我国政府对精英群体回流十分重视,并给予了許多政策支持,包括专项资助计划和多方面的配套服务,希望通过这些支持政策推动更多海外精英群体回国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人才动力。但对于非精英群体,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帮扶政策。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非精英群体的回流与再适应,笔者有以下思考与建议:

首先,要保障非精英群体回流后的基本生活需求,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与配套服务。如将回迁移民一并纳入当地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与社会救助规划之中,加强是对回迁移民的基本国情的宣传教育,切实帮助回迁移民解决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困难与问题,加快回迁移民的社会融入。其次,对于海外移民数量庞大的侨乡来说,无论是精英群体还是非精英群体,回流者数量都相当可观。如果能整合好这方面的资源,对于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无疑是有益的。基于此,地方政府可以建立“归侨交流中心”,以供回流移民特别是非精英群体进行交流、分享并整合跨国资源,为创业和再就业寻找合适的资源。同时,当地政府也要为非精英群体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生活。最后,大部分非精英群体在回流后可能无法继续从事与海外相关的工作,需要对他们进行再就业培训,这对于促进其职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 讨论

回流并不代表迁移计划的结束。除了笔者上述提及的结构主义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等国际移民迁移理论,现在被普遍应用于移民研究的跨国主义理论认为,移民的回流往往超越狭隘的局限在移居地与回流地之间单向的选择,回流更多是“往复式回流”。^① 笔者访谈时注意到,受访者回流后的居住地并不限于自己的祖籍地,其中有7位回流者居住在祖籍地之外的城市和地区。有些人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而迁移至更宜居的城市,有些人为了照顾工作的子女或方便工作等原因,也搬到其他地区生活。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结束了一段国际迁移行为,但在国内却并未停止迁移的脚步,有些回流者(主要为50岁以内的群体)甚至还计划未来开始新的跨国迁移。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海外移民出于安全考虑而计划选择暂时回国。但随着不确定性以及回流地相关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移民将对诸多方面的因素进行权衡及考量之后做出是永久性回流还是流动性迁移的决策。

^① Cassarino Jean-Pierre, "Theorising return migration: The conceptual approach to return migrants revisited",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vol.6, no.2 (2010).

倘若越来越多的海外移民回流,这势必会对流入地民众出国意愿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挫伤其出国积极性。相比 20 世纪大量选择出国的中国人,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回国,人们不禁要再次衡量出国的性价比,是否值得自己放弃国内已有事业,去到人生地不熟的海外开始一番新的打拼。就目前来看,如果国外没有亲戚朋友为跨国移民打下一定的经济基础、有一定资源的情况下,自己出国从头开始,大部分人都不太愿意冒险。虽然国内收入不高,但至少在生活方面更加舒坦,语言交流无障碍,也有亲人朋友陪伴,综合考虑还是在国内较为稳妥。目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的人口流动受限,但这只是短期现象,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未来国际人口迁移将更加频繁,非精英群体回流的规模可能也会增加,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应当给予持续关注。对于回流群体而言,除了回流者自身应该做好包括心理、行为、经济上的准备,如果当地政府能够给予适当支持,或许能帮助回流者更好地适应回流生活,同时也能更好地链接华侨资源,促进当地社会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责任编辑:徐曼雪)

Research on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Effect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Urban Air Quality

ZHANG Zhenbo

The Easterlin paradox hypothesis used to describe the impact of economic incom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gradually shows its connotation in the field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y will show higher satisfaction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but at the macro level, the public's sense of environmental gain in areas with better environment is not necessarily higher than that in areas with poor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air quality in cities and the resulting gap in public environmental gain,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lative deprivation effects on public environmental satisfaction, so as to verify the existence of the environmental Easterlin paradox and analyze its Generation mechanism. Empirical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public environmental satisfaction is highly sensitive to air pollu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air quality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public's sense of environmental gain, and will magnify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air pollution on environmental satisfaction. Through further mechanism analysis and heterogeneity test,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effect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environment will dampen the enthusiasm of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romote the thought "Not In My Back Yard". Socially vulnerable groups such as low income and low education level are affected by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effect of the environment to a higher degree. This study verifies the existence of the environmental Easterlin paradox, and proposes that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effect of the environment is an inducing factor that leads to a non-consist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overall environmental satisfaction. Therefore, the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rationally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and functional layout in the region, focus on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high-pollution areas, and promote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and overall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the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public's sense of environmental gain.

Israeli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Innovation: Path, Characteristics, Challenges and Enlightenment

DING Qi

The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innov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and promotes the simultaneous growth of economic strength and national defense strength. The Israeli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innovation, which is jointly promoted by the country's external security factors and domest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that are, the initial appearance, the driving innovation and the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efficient and flexibl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clustering and optimization of innovative elements, and multi-level and all-round international military cooperation. Although in the new era, Israel's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innovation faces the challenges of the reform of the compulsory military service system and the declining vitality of nation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summary of Israel's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current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in China.

**Research on the Return and Readaptation of Non-Elite Groups
——Taking the Returned Immigrants from Fuqing City, Fuji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CHEN Youhua, HONG Xiaoyu

The author takes 12 non-elite immigrants from Fuqing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conducts a qualitative study on the reasons for their return migration and readapt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elite immigrant groups, non-elite immigrant groups themselves will face more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backflow and readaptation due to their lower overall quality and less capital. In addi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dual forces of the home country society,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the immigrant individuals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readjustment, although some discomfort occurred, the returnees did not show a negative and pessimistic attitude, but only regarded them as normal phenomena.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family support, localization, relearning of social behavior, transna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linking of resources can help them better adapt to life in their home country.